

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

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

张仁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仁福 著

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

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
(增订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愈与欧阳修文风的文化透视(增订版)/
张仁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04-7737-2

I. 中… II. 张…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②韩愈
(768~824)—对比研究—欧阳修(1007~1072)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0183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木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9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157千字

定 价 2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增订版序言

张仁福同志的学术专著《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于1992年1月出版发行后不久就全部告罄，但仍不断有读者向出版社和作者索求此书。十多年来，数种精选名人论述文化问题的书籍，也将张仁福书中的某些章节辑入书中；一些研究韩愈、欧阳修的论文中也曾引用过张氏书中的文字；还有从网上下载的……这说明此书在社会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由于当时印数偏少，供不应求，加之作者又有增补的要求，因而再版此书亦在情理之中。

这次修订再版，作者除对原书中的某些错漏作了更正外，又增补了“关于文化”和附录于书末的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中的“南北考证学不同论”。

对全书的一些个人意见，可参看我在此书初版时的序言，这里不再赘述。下面只想对增补的部分，谈点个人的读后感。

我在此书初版序言中曾提到作者是按照自己所认同的“文化”概念作为该书立论的出发点，继而来论述中国南北文化与韩、欧文风的关系及其有关问题的。意在提醒作者进入正题之前，需将自己所持的“文化”概念作个交代或论述，以便读者明白作者所掌握的基本原理和评判尺度。只因当时此书付印在即，一时来不及补上，只好留待再版时增补了。为此，作者趁此书再版时，专辟“关于文化”一章加以论述，以补其缺，了其心愿。

在“关于文化”一章中，作者首先对“文化”概念的言人人殊的

情况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其次对“文化”一词的源流，对“文化”、“文明”、“人文”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文化”有“广义”（“大文化”）和“狭义”（“小文化”）之分，以及有关文化结构的几种说法等问题，作了综合性的述评和介绍；最后表明作者所认同的观点：“关于文化的概念，就是指人类所进行的一切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包括物质财富；既指一种过程，也指这个过程的结果。简言之，人类实践的能力、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即文化。它包括三个层次：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而价值观念，或者说精神文化，则是文化的核心。这就是文化概念的全部内容。”言简意赅，言必有中。简言之，补入“关于文化”这一章，是全书不可或缺之一环。此其一。

其二，辑入附录中的《南北学派不同论》，不仅是刘师培著作中的一篇力作，而且是学术界讨论南北文化问题方面的一篇重头文章，而南北学派问题又属南北文化问题中应当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去而不论。刘师培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分成六个部分：总论、南北诸子不同论、南北经学不同论、南北理学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南北文学不同论。作者以深厚的学术功底、渊博的知识素养、敏锐的学术眼光、务实求真的史家笔法，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对南学、北学的各种学派的源流、学说、观点、特点、异同、得失等方面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和评价。其中常有画龙点睛之笔和一言中的精辟论断，不愧是出于国学大师之手笔。像这样一篇讨论南北文化学派的重要论著，却没有引起某些编辑出版“南北文化”类书籍者的注意或重视，他们不仅没有将其全文收入，甚至连刘文的只言片语都没有提及，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好在有些读者看了张仁福的《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一书及其附录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当即顿开茅塞，不仅为张著叫好，而且对刘氏大作深表佩服，引起深研其文的兴趣。可惜当时没有将其全文录入，其中缺了“南北考证学不同论”这一章，给读者留下了缺憾。这次再版此书时，弥补了这个缺憾，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南北考证学不同论”，是全书中文字最多的一章，所论正好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中的主导方法：考据学。本章对宋元以来的考据学，尤其是清代的考据学，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评判，不妨将其当作清代的考据学简史看待（至少本人有这种看法）。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里还涉及如何看待考据学的问题。一提到考据学，有人不免会皱起眉头（指没有兴趣），这也难怪，人各有志，各其所乐，不必强求。但是，对于学术界来说，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绝非可有可无的问题，它关系到文化遗产如何继承和发扬光大的问题，如何开创学术研究新局面的问题，如何建设更先进的民族优秀文化的问题。考据学既然是前人研究古代文化的基本方法，必然有其值得继承或总结的东西。当今一些学者呼唤传统文化的“复归”，其动机之一，是出于对今后如何更新学术研究方法的思考而提出来的。诚然，“复归”并不等同于“复古”，也并非照搬前人的经验方法，而是在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对其精华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从而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譬如建设一种称之为“新考据学”的学科，有志者不妨一试。就以综合性研究方法而论，势必离不开考据学。正如有的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如果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法中的考据学为主干，在保持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有选择地汲取外来方法中的有益部分，给予改造和更新、“脱胎换骨”，形成新的研究方法，想必会开创崭新的学术新局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可见，前人的考据学值得研究、总结，可以继承和创新。

最后，想对本书及其作者给我的印象说上几句。

张仁福同志在大学读书期间，勤奋好学，品学兼优，被视为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研究生毕业后，没有实现其专业对口的愿望，成了某大学双肩挑的中层领导干部，只能在百忙中抽时间做些与专业相近的事，诸如编写文科教材之类，还兴致勃勃地翻译了些外文著作，成果虽然不少，但他仍不忍放弃过去所从事过的研究方向，因而首先想到增订《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愈与欧阳修的文化透视》一书，想借

此契机，重操旧业，继续将原定的研究方向坚持下去。此举自然值得鼓励。“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笔者过去也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理，历经世事，方能大彻大悟，人生真谛自在心中。在我看来，一个人的学术生命保持长盛不衰，也是一种幸运！仁福同志正当中年，时间尚充裕，希望能从自身的实际出发，盘点既往，规划未来，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新的成绩。

仁福同志求吾写篇再版序言，于是挤出时间重读其作。平心而论，与他过去所写的其他论著比较而言，此书不失为一本力作。作者功底实在，阅读广泛，每逢文献典籍，如数家珍，左右逢源。其论事出有据，言必有理。其间有些章节或段落，每有独到见解，或有突破旧说之处，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好书。读罢原著，沉思良久，是为之序。

殷光熹

2008年9月6日

于昆明翠湖畔听雨斋

序

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辉煌，为世人瞩目。从文体分类研究的角度看，诗、词、小说最盛，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散文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其实，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姑且不说其他，仅以唐宋散文来看，作家作品之多，实在令人惊叹。要对这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搜集、整理和研究，实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长时期的努力。就以大家熟悉的“唐宋八大家”为例，近四十年来，围绕“唐宋古文运动”的问题，发表过不少论著，其中又多半集中在韩愈、柳宗元身上。这些研究成果固然应当充分肯定，以传统为主的研究方法也无可非议。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宋散文作一些新的探索，有所突破。这当然需要有耐得住寂寞、乐于献身科学的有志者。近读青年学者张仁福的新著《中国南北文化的反差——韩欧文风的文化透视》，不仅被书中的论述所吸引，而且为出现知难而上的有志者感到高兴！

本书从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角度，比较研究了韩愈和欧阳修散文风格的南北差异。作者按照文中所说明的“文化”概念，从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入手，即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又从宏观的角度，多学科、多层次地探讨了韩愈、欧阳修散文风格形成的互异现象和原因，并着重探讨了形成韩欧散文不同风格的文化根源和历史渊源。全书能在宽广的覆盖面中突出韩欧文风，在韩欧文风的相通而又相异中揭示

联结中华民族的南北文化心理结构。这当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才能得到正确或圆满的回答。要做到这一步，难度是相当大的。令人可喜的是，本书作者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获得了可喜的成绩。

本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个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并且运用多种学科知识进行综合性研究。书中所论述的问题，不仅内容丰富翔实，新意层出，而且颇有深度、广度和理论色彩。从本书所选取的角度和行文的思路可以看出来，作者力图避免两种偏向：或仅就韩欧文风而论韩欧文风，或离开韩欧文风而泛论南北文化。通过对韩欧文风的精细剖析，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层层深入，步步推进地探讨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南北差异和形成韩欧文风互异的文化根源。显然，要研究韩欧这样的“连体作家”及其散文风格，不从南北文化的角度去进行深入考察，是难以说明其差异和特点的。作者正是抓住这一关键所在，按问题逐一展开，上下勾连，多方比较，使一些问题迎刃而解，新意自见，令人折服。为了说明这个看法，这里不妨略举数例，供读者思考。

作者在考察问题的时候，首先是抱着求真的科学态度，以事实为根据；惟其如此，得出来的结论或看法，才能站得住脚。例如作者在通读韩欧文集的基础上，将韩欧一脉相承的篇章，一一作了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并选择其中具有可比性的代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出一一对应的两组特征，证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韩欧文风的互异形态，即刚健、雄正、愤激、壮直、质木、拙劲、迅急、疏括等，大抵代表了韩文风格的一些特征；柔婉、飘逸、哀婉、委曲、轻丽、纤巧、纤徐、缜密等，大抵代表了欧文风格的一些特征。在每组对应篇章的比较中，欧文与韩文的相承关系，从主导方面说，不是“顺承”或“同化”，而是“反向”或“分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引号内的字，前者代表韩，后者代表欧）：化“刚”为“柔”，化“雄”为“逸”，化“气”为“情”，化“直”为“曲”，化“质”为

“丽”，化“拙”为“巧”，化“促”为“徐”，化“粗”为“精”等等。由此可见，“欧阳修规模韩愈而文风发生严重变形以至互异的现象，实质上就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以前南北文化差异的折光反映”。从文化情境来看，韩欧相异者多于相同者：韩愈在先秦众多的文化“染色体”中，本质上汲取的是北方的基因，文中虽涉庄骚，但并未深入其精神世界，最后还是落脚到以儒家为主体的北方文化范畴。从表层上看，欧阳修思想和创作同韩愈有某种继承关系，但其文化情境的南方底层（老庄屈宋）仍然稳固未变，并没有超越先秦以来的南方文化体系。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心灵构造是南方的，北方规范只是叠加于其上的追加层次。”这样看来，欧文具具有相当浓厚的楚骚风调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文中还提出了常常被人忽略的问题，即“欧‘道’中有老庄印记”的问题。目前研究韩欧者，一般都认为欧阳修所说的“道”与韩愈所说的“道”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者仅在于前者是强调“致用”——通过实践求“道”，有补于时事。这固然不错，但忽略了欧阳修受庄骚的影响。文中以众多的作品，并结合作家的一生行事，作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在阐明不同的继承关系所反映出不同的文化情境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谈到了韩欧文与《史记》、《文选》等书的继承关系问题。以《史记》为例，韩欧都与之有密不可分的继承关系，但各有侧重：韩愈对《史记》的继承，主要是“排戛雄奇”一面到位，“抑扬唱叹”一面不到位；欧阳修则与之呈相反状态。原因就在于韩愈与北方文化有更多的联结；欧阳修则与南方文化有更多的联结。话说得活脱圆通，易于被人接受。

作者在求真的同时还力图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求新。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微观问题的研究上，也体现在他对宏观问题的审视上。

作者本着求真探新的精神，在对韩欧文风作比较研究时，对所依据的材料（如韩欧作品），大都经过一番细心的考察和研究，以便在使用它们时能够准确无误，或者尽量减少误差。譬如过去人们对《醉翁亭记》主题的解释就有多种，“宣扬政绩”说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

的一种说法。本书作者在通读欧阳修的全部作品和查阅有关文献时，发现“宣扬政绩”的说法与实际不符。一查《滁州志》，真相大白，“原来滁州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欧阳修在滁州期间，主要做了“修城防盗”和“求神祈雨”两件事，所以“谈不上有卓著政绩”。他认为《醉翁亭记》对滁州优美山水、民生和乐的描写，多半出自作者的想象，并非滁州现实的真实写照，而是把现实中没有实现的理想，幻化为美好的东西——一种“桃花源”境界罢了。这种解释和看法，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

从宏观审视的角度看，全书围绕着韩欧与南北文化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论述。作者居高临下，眼观四方，穿针引线，左右穿梭，如同在编织一幅中国南北自然人文环境图，泾渭分明，一目了然。例如文中探讨自然人文环境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关系时，认为前者决定后者，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又反作用于前者。又论及南北不同的自然人文环境对北人和南人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形成的不同因素及多种表现形态，还从南北民情风俗来部分地印证南北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引人注目的是，书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南北文化心理结构，即从民族性格、价值标准、情感形态、思维方式等方面逐一剖析了南北差异。概言之，全书的覆盖面相当宽广，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本书在论证问题时，没有满足于材料的充实和对问题的阐释与说明上，还特别注意到对材料的分析、提炼和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论证。因而深化了认识，揭示出某些带有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东西。例如在“韩欧创作个性与南北差异”这一章，作者认为，韩欧各自的文化情境（河洛文化和吴楚文化的熏陶）及其同前代（先秦与魏晋南北朝）南北文化的联结，决定了他们在文风成因上与南北差异有关，如个性作风、文学思想、审美风尚、思维定势等。从个性作风看，两种不同的个性作风形成韩欧不同的风格。从文学思想看，韩愈的“不平则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本质上虽无大的区别，但联

系他们各自的表述方式和某些创作来看，同中有异：在情感形态上，韩愈“主气”，多倾向于直抒胸臆（韩文也有比兴，只是其中多注重“比体”的内蕴和质感，而不注重声色）；欧阳修“主情”，多倾向于感物兴怀（多注重“比兴”形式）；韩重“赋格”，欧重“比兴”。韩愈所云“不平”所产生的“气”，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感，带有更多的激情、气概。欧阳修心中的“情”，是借助于外物的感发而表达出来的，讲求中节。前者有些类似燕赵的慷慨悲歌，后者有些接近江左的流连哀思。这正是南北差异的一种表现。作者还以韩欧议论文为重点，探讨了思维方式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风特征。从韩欧各自对“道”的理解和阐发中，正集中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势，即韩愈的“外观博取”的思维定势在起支配作用；欧阳修则是“内省求精”的思维定势在起支配作用。这两种思维定势也正是南北差异的一种表现。两种思维定势必然形成韩欧议论文的不同风格特色。作者在本章的结尾还综合了韩欧文风差异及其成因的不同，以图表示意韩欧两大作家的风格结构，将自己的独到见解，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和较为扎实雄厚的功力，我想是不可能写出具有这样学术理论深度的文字的。

书中还提出了一些令人深思和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其中有的问题前人也曾提出过）。诸如唐宋之际，“中国南北错位”的问题。在作者看来，这个问题也同样涉及如何认识韩欧文风的南北互异现象问题。细加思索，这确乎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有趣课题。在这里，作者也谈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韩欧文风的南北差异，并非偶然现象；它正是唐宋之际中国南北文化错位的一个必然结果。”接着从农业经济、人口分布、行政区划、大城市分布、军事割据、人才结构等方面详细地论证了历史发展到唐宋之际，“几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国南北人文生态的对比开始出现对峙和换位的局面，即是说：唐以前，北盛于南；宋以后，南盛于北”。在这个“南北大换位时期”，始终存在着“南北竞争问题”，“在唐代，它主要表现为

南北文风的斗争；在宋代，则主要表现为北方集团对南方人才的压制”。“正是二者的冲突和交融，才形成唐代文学的蔚为壮观的局面。”到了宋代，以南人为主体的宋代文化风格，就同以北人为主体的唐代文化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并引述了中外学者关于唐宋两代的社会风尚及文学创作方面的著名论述作为佐证，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唐宋文学之间的反差，唐诗与宋诗的区别，唐文与宋文的区别，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反映。而韩愈和欧阳修，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但颇具代表性的缩影而已。”平心而论，这些看法不无道理；若能诱发更多的人继续探讨唐宋之际中国南北文化的“换位”问题，至少也说明该书作者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全书的总体结构还是紧凑的，论述过程中，逻辑也较严密。还有文字的精练，文笔的流畅，等等，都能说明作者有过全面训练的基础，加上个人的才气和刻苦努力，写出了这样一部颇有分量的学术专著。

读完书稿，我还有点美中不足的感觉。书中有的带交叉性、多重性的问题，尽管作者力图将它说清楚；我读后，总有点不尽如人意的感觉。个别问题，内容的延伸，似嫌过宽过远了些，关键在于与韩欧文风挂钩不够，即便有，也有点勉强。当然，这些小疵，无伤大局。总的来说，我对这部书的印象是很好的。为此，特向广大读者推荐。

以上所谈看法，难免有不当之处，仅供参考。

殷光熹

1991年1月15日写毕

目 录

一 引子	(1)
二 连体作家	(4)
三 谜中之谜	(9)
四 关于文化	(18)
五 韩愈、欧阳修与先秦南北文化	(28)
六 韩愈、欧阳修与魏晋南北朝南北文化	(42)
七 中国南北自然人文环境	(60)
八 中国南北文化心理结构	(79)
九 核心地带：河洛和吴楚	(92)
十 韩愈、欧阳修创作个性与南北差异	(99)
十一 唐宋：中国南北错位	(111)
十二 尾声	(122)
附录 南北学派不同论	(126)
后记	(171)
增订版后记	(174)

一 引子

艺术与它所归属的文化同形……

——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

1986年，在那场突如其来风靡全国的文化热中，正当人们不厌其烦，喋喋不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争论不休之际，上海举行的一次讨论会却别开生面，议题是“海派”文化和“京派”文化的区别。事情虽然是旧事重提——在20世纪30年代的同一争论中已以鲁迅先生的“北人大抵厚重，南人大抵机灵”的平允之论一锤定音，但在新思潮新视角的刺激下，这两个本来发端于艺术部门的“戏称”现在一本正经地扩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尽管没有长篇大论，但大多不乏新鲜见解。与会者认为，正如一切文化都显示出“内核”与“边缘”两重构造一样，在中华文化这个大文化圈内，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属于内核文化，由它向周边地区辐射，从而形成一个文化圈；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处在这个文化圈的边缘，属于边缘文化。“京派”文化是中原内核文化的一部分，“海派”文化则是东南边缘文化的集中代表。上海自开埠以来，人才荟萃，带来了各地文化的特色，并有“欧美风雨”侵蚀的痕迹，但又始终保持着自身的传统本色。讨论会在总结30年代争论的基础上，还简单概括了“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区别：

“京派”文化注重传统的因袭和继承。讲究师承关系，强调

门户分别，严格遵守艺术规范和技巧，重视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治学讲究渊综广博，追求深芜，穷其枝叶。其总体特征是踏实谨严；长处是关注现实，追求进步，但由于受传统的影响较深，又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相反，“海派”文化不大注重师承关系，不大讲究流派规范，不墨守成规，勇于革新创造，思想活跃，善于吸收新鲜事物；治学讲究精通简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总体特征是创新、开放、多样、善变，但又夹杂着轻佻、肤浅和浮华之弊；求新有余，谨严不足。

事隔不久，文化热余波未平，又有人津津乐道地谈论起北京文化和广州文化的区别：

北京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或者说“皇城文化”，广州文化是一种大众文化，或者说“市场文化”。北京人关心政治，爱议论时政，富于忧患意识，忧国忧民忧天下。然而其负面表现为“救世主文化”，以为全国看北京，唯北京马首是瞻，一切取决于上层建筑的决策与进退，倾向于用政治手段解决其他经济文化问题。而在广州，政府的影响和作用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广州人认为文化不应围着官场转，不能老是上面感冒发烧，下面吃药，文化应围绕着市场转才有生命力。如果说，北京人关心的是某些重要人物的进退升降，广州人关心的则是政策不变……

不论是“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区别，还是广州文化和北京文化的区别，这些并非系统而深入的议论却共同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当代存在南北文化的差异。

问题并不难于理解。作为一个拥有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文明古国，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构成之复杂，世所罕见；地形和气候多样，从最北端的漠河到最南端的曾母暗沙，南北跨越的纬度近 50 度，

平均气温相差 24℃；各地区民情风俗大相悬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不尽相同；加上数千年历史铺垫的深厚的文化积层，漫长封建社会经常性的割据和战乱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的惯性，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近八百年的南北对峙（先秦、三国、魏晋南北朝、宋金）的文化投影，易于形成南北文化的差异可想而知。

然而，令人困扰的是，要全面而系统地分析这种南北差异，几乎绝无可能。我们一谈论起来，不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谁也说不清楚，谁也说服不了谁。

中国的南北文化，至今是一个谜。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就其文化形态看，它的现在和它的过去一模一样。今日中国，是昨日中国再完整不过的继续；而历史发展的程序，总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既然我们不能把握今天，就让我们先探讨昨天，去看一看古代南北文化。不过，我们又不想泛泛而谈，对古代南北文化作包罗万象的分析、描述、阐释、概括，从而提供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图像，因为这在事实上并不可能。何况谈论文化是一件棘手的事。据说，国内外有关文化的定义不下五百种，我们无所适从；而西人罗威勒说得更玄：“再没有比谈论文化更危险的了。它实在令人难以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因为其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描述，因为其形态千变万化。它仿佛空气，除了不在我们手中以外，它无所不在。”于是，我们只好避难就易，避虚就实，选择两个具体“个案”，从古代的两位知名作家谈起。因为艺术不是部分地代表文化，而是全部地代表文化。“归属于特定文化的艺术是该文化类型的独特模型，是它的形象肖像……艺术与它所归属的文化同形。”^①也许，通过对这两位作家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我们多少可以窥见和领悟中国古代以至当代南北文化的差异。

① [苏] 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凌继尧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年版。